

程 美,孟维平

CHENG Mei, MENG Wei - ping

曾志忞的人生三部曲

内容提要: 本文把曾志忞的一生概括的分为留日求学的早期阶段、归国兴学的中期阶段、京剧改良的晚期阶段。尽可能简约而全面地把这位先驱者的音乐生涯展现给读者^①。

关键词: 曾志忞 留日求学 归国兴学 京剧改良 近代音乐史上的众多第一

一、曾志忞简介

曾志忞(1879—1929)号泽民,又名泽霖,祖籍福建同安。1879年(光绪五年)曾志忞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曾铸是一名商人,妻子曹汝锦是亲日派代表曹汝霖的妹妹。早年曾志忞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并自学绘画及音乐。1901年曾志忞夫妇一起赴日留学,1907年回到上海。在沪期间年仅16岁的儿子宏杰病逝使二人倍受打击,于1913年移居北行。1929年夏,曾志忞病逝于北戴河,享年50岁。

1、早期(1901—1907)——留日求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曾志忞夫妇一起赴日留学。曹汝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志忞则遵从父命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但初到日本,他就深受明治维新运动中学习西方音乐热潮的影响,他曾说:“予初至日本,观其音乐会及访其教师,一若天仙之隔,高不可仰,

盖崇拜之甚也。”1903年曾志忞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事实上,1902年他就参加了沈心工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组织的“音乐讲习会”(该会为期两个月)。1904年的曾志忞已成为东京留学生音乐活动的主力之一,同年6月30日他在原“音乐讲习会”的基础上组建了亚雅音乐会,内分声乐、军乐两科,专门研习近代音乐。亚雅音乐会的宗旨是“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会员计有五十多名。亚雅音乐会比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早15年,所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正式组建的第一个新式音乐机构。

1904年8月27日亚雅音乐会举办了一次留学生返国送别会,共131人参加,其中包括日本新音乐发起人之一宝伊泽修二和曾志忞的老师铃木米次郎。节目中有昆曲、笛子、风琴独奏、声乐独唱以及曾志忞夫妇的钢琴合

^① 目前对曾志忞相关的研究主要有:韩国镛,海外华裔音乐学家,他1990年出版的《韩国镛音乐文集》中包括《曾志忞生平再探》一文;姬群,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2005年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发表《曾志忞音乐教育思想的矛盾性及其历史文化内涵》,2006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表《曾志忞音乐教育思想简论》;刘绵绵,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音乐学博士,2006年在沈阳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中发表《中国近代言“乐理”之第一人——曾志忞》一兼对杜亚雄《中国乐理结构体系刍议》之补遗,2008年在《中国音乐教育》第7期发表《曾志忞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十个“第一”》;张伟,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员,于2008年5月11日的《新民晚报》发表《曾氏父子与上海贫儿院》;陈聆群,上海音乐学院教授,200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说起》等。

收稿日期:2011-05-20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30(2011)03-0065-04

作者简介:程美,女,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09级中国音乐史研究生(北京,100048);

孟维平(1955-),男,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器乐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00048)。

奏。《新民丛报》曾报道他们二人的表演为：“幽闲勇健，如入欧洲音乐界，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节目中还包括留学歌和送别歌等合唱曲，其中有一首《东京留学》，歌词为：“留学生，留学生，光辉灿烂留学生。少年人，少年人，文明古国少年人。祖国有我生颜色，为国为民是天职。我为祖国增光荣，敬业乐群进无穷。”^②充分体现出中国有志青年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曾志忞留日的七年间编写了《乐理大意》、《教授音乐之初步》、《教育唱歌集》、《音乐教育论》、《乐典教科书》、《音乐全书》、《和声略意》、《音乐四哭》等音乐理论书籍和文章，成果颇丰。

2、中期(1907—1913)——归国兴学

1907年曾志忞学成归国，此时正值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启蒙时期，他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近代音乐的发展建设中。1907年—1913年间，曾志忞凭着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在上海兴办音乐教育。他与高寿田^③、冯亚雄^④等人创办了“夏季音乐讲习会”，帮助父亲经营上海贫儿院，在院内组建了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并与高寿田、冯亚雄创办了《上海贫儿院第一次报告》(《报告》相当于院刊，笔者注)。

曾志忞在《报告》中介绍了创办贫儿院的原因：“予幼居西城，邻近半住贫民，自朝及暮啼哭之声不绝于耳，一以家庭失教，一以饥寒交迫……。予自塾出，恒于庭中聚邻儿给以食饵，寒冬则偶以热粥汤与之。……墅左右半系老圃，生儿不及五六岁，已随母至圃场，母耕作久儿厌则啼，母耕尽耕儿啼尽啼。尚系父母俱存者，若亲故儿多，则媳养奴卖。……在当时申城仅有私塾无学校，仅有义塾无给衣食者，

良心上固有一种救助之愿……”^⑤可见曾志忞是一位极富同情心和责任感人，生活在社会底层贫民的饥寒交迫和孤儿无家可归的社会现状，更坚定了他创办贫儿院救助民生的决心，通过借鉴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创办教会学校的经验并结合日本创办慈善事业的方法，他同父亲开始创办上海贫儿院。

《报告》中记载了很多与曾志忞相关的内容，如他的文章“《予之贫儿观》、《新京都之闻见》”；他编写的歌曲《院歌其一、其二》、《追悼创办人曾少卿先生歌》；还有他任指挥的音乐会节目单《恩亲、纪念会演奏曲目及梗概》等”。“1908年4月26日(光绪三十四年)，曾少卿(曾铸)‘冒疾亲往’视察贫儿院建筑工程，因‘徒步过劳，病因复发’而病重逝世，‘逝世遗命其子志忞承志开院’，从此曾志忞担起了创建上海贫儿院的主要责任”^⑥。1913年夏，曾志忞因沪南兵灾北行，从事自己的本行——律师业务^⑦。

“上海贫儿院由高硯耘作为‘主事’掌管”，“1915年9月10日(民国四年)，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获巴拿马赛会特奖金牌及奖凭三张。”^⑧可见贫儿院管弦乐队在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

目前关于曾志忞离沪北行的时间和地点尚存在一些分歧：曹汝霖的自传《一生之回忆》(简称曹文)中写到：曾志忞夫妇因“儿子宏杰不幸夭折，受此刺激，到北京散闷，藉以归宁。时值夏天。”；学者韩国鎔在《曾志忞生平再探》一文(简称韩文)中引用曹文观点，但在韩文认为：“曾志忞于1921年，因丧子痛心全家迁往天津”；史学家向延生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⑨中同时参考了韩文和曹文，他倾向于韩文的观点；2008年上海音乐学院图书张伟

② 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

③ 高寿田又名高硯耘，上海人，留日早期曾在东京音乐学校主攻小提琴，归国后在上海贫儿院任教。

④ 冯亚雄，又名冯历夫，上海人，1905年到日本东京上野音乐院学习，曾在“明治音乐会”学长笛、单簧管、圆号、长号等乐器。

⑤ 陈聆群：《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说起》，《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⑥ 同上。

⑦ 张伟：《曾氏父子与上海贫儿院》，《新民晚报》，2008年5月11日。

⑧ 陈建华、陈法：《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音乐出版社，第20页。

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所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认为:“曾志忞于1913年因沪南兵灾北行”;史学家刘再生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⑩一书中关于曾志忞的介绍引用了张伟的资料,但离沪时间却成为“1923年”。经笔者仔细核实史料之后,认为曾志忞夫妇离开上海的时间就应该在1913年。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在“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一节中清楚地写道:“二妹偕志忞并携外孙宏杰也来了,宏杰才五岁”。曾志忞夫妇于1901年留学日本,由此时间推出宏杰应为1896年出生,十六岁病逝那年正是1913年。张伟所指的“沪南兵灾”也正是1913年袁世凯在上海刺杀宋教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这一事件。另外,1914年时曾志忞已在《顺天时报》上连续发表《歌剧改良百话》了。

关于曾志忞离开上海之后到底移居北京还是天津也有异议:曹文称“曾志忞夫妇到北京散心”,张伟也认为曾志忞移居北京,但韩文以为是移居天津。笔者推论,很可能他抵京后并未久居,而以在天津新购置的房产为常驻地,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

3、晚期(1913—1929)——京剧改良

移居北行之后,曾志忞以律师为业。此时的北京正值京剧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常赴北京的曾志忞逐渐对京剧产生兴趣,他与平津一带戏曲界接触频繁,“半日谋生,半日习京剧,一词一句,一腔一调,细细研究”就是他生活的写照。对京剧艺术的研究正是曾志忞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态度转变的重要开端,从早年认为“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破坏不可,非大破坏而先大创造亦不可”,转变为“我中国人极富有音乐的天资之种族也(外人论中国无音乐知识,非确论)”。

1914年4月8日到6月18日,曾志忞连续发表于《顺天时报》的《歌剧改良百话》一文^⑪,系统阐述了极富革新精神的京剧改良思

想,如积极主张用五线谱代替工尺谱、采用西方乐器作为京剧伴奏等等。日本人武雄曾在《中国剧》一书中引用了几段京剧曲谱,其注释为“友人曾志忞君所编的京剧第一集”^⑫。《歌剧改良百话》公开发表于报刊后引起一定的反响^⑬。1914年5月曾志忞还在北京组织过“中西音乐会”(该会于1915年11月停办),高砚耘与冯亚雄从上海贫儿管弦乐队中挑选了31名学生前来参加,在北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曹汝霖的自传《一生之回忆》中,对曾志忞晚年的生活进行了简单描述:“在北戴河置别墅,立界石刻‘心坟’字样,于新年在桌上置一盘血淋淋的猪心自祭(表示他心已死),又因酒毒成肝硬化症,性变暴躁,动辄骂打,乃至他的夫人独自回到上海”。曹汝霖评价曾志忞是“志高物傲,所如辄左,怀才不遇,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愤世嫉俗之意,卒以酒病丧生,为之惋惜”^⑭。

二、曾志忞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创下的众多“第一”

1、刘绵绵关于《曾志忞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十个“第一”》

(1) 1903年7月,曾志忞的《乐理大意》是目前所见中国人最早发表的介绍西洋乐理的文章,他也由此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位在汉语中公开使用“乐理”一词的人。

(2) 1903年在《江苏》第7期上曾志忞以简谱和线谱对照刊印发表的《练兵》、《扬子江》、《秋虫》等六首乐歌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公开发表的乐歌。

(3) 1904年4月15日,曾志忞编著的《教育唱歌集》在东京出版,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唱歌教科书。

(4) 1904年5月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

(5) 1904年6月,曾志忞组建了中国近代

⑩ 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⑪ 《顺天时报》1914年4月—6月,国家图书馆缩微阅览室。

⑫ 韩国鎔:《韩国鎔音乐文集》(一)—《曾志忞生平再探》,乐垠出版社,1990年1月。

⑬ 曾志忞发表:《歌剧改良百话》的《顺天时报》上,曾经有署名为“秋水”的人与曾志忞就其京剧改良思想进行争鸣。

⑭ 韩国鎔:《韩国鎔音乐文集》(一)—《曾志忞生平再探》,乐垠出版社,1990年1月。

音乐史上第一个新式音乐社团“亚雅音乐会”。

(6) 1904年8月出版的《乐典教科书》被认为是目前可考我国最早出版的由中国人编译的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乐理的教科书。

(7) 1905年3月出版的《音乐全书》中《乐典大意》是中国最早关于西方乐理知识的普及读物。

(8) 1905年9月和11月连续发表的《和声略意》是中国人介绍西方和声学知识最早的文章。

(9) 1909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

(10) 他还是我国最早提出创作“新音乐”的音乐家。

2、笔者通过对曾志忞的研究,又有新的修订和补充:

(1) 刘文认为上海贫儿管弦乐队成立于1911年。然而根据新史料证实,曾志忞组建的上海贫儿院管乐队于成立1909年4月20日,6月3日在纪念曾铸病逝一周年暨纪念会上已公开亮相。弦乐队成立于同年的12月。1910年6月3日,在纪念曾铸病逝二周年的纪念会上,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首次公开亮相。^⑮

(2) 刘文中仅对《音乐全书》第一编《乐典大意》做了评价。笔者认为《音乐全书》的第二编《唱歌教授法》也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

全面的从理论的角度讲授唱歌知识的教科书;第三编《风琴习练法》同样也是我国第一本风琴曲谱集,文中附有大量曲谱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曲谱资源。

(3) 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的先行者,曾志忞的《歌剧改良百话》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从中西音乐结合的角度正式发表的全面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介绍京剧改良思想的文章,很多设想都已成为了今天的现实。

结 语

梁启超盛赞曾志忞“为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韩国鏞称他为“早期推广新音乐的先驱”;冯文慈先生评价他“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音乐理论和社会音乐活动方面的先驱之一,为从日本引进近代音乐文化做出重要贡献”^⑯。通过对曾志忞人生三部曲的解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生活轨迹。就曾志忞的音乐思想而言,冯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他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早期音乐思想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从主张以西为师到重视传统、创新发展的思想转变,也是作为中国新音乐先驱者曾志忞音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转变应该是他在那个特殊社会环境下进行音乐探索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吴晓丹]

⑮ 张伟:《曾氏父子与上海贫儿院》,《新民晚报》,2008年5月11日。

⑯ 韩国鏞:《韩国鏞音乐文集》(一)—《曾志忞生平再探》,乐坝出版社,1990年1月。

(上接第43页)

参考文献:

[1]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钱志熙:《论蔡邕叙“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

[3] 洪皓孙:《三国职官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55年。

[4]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5] 许继起:《两汉掖庭女乐考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吴晓丹]